

毛泽东七大后的第一个大错



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与蒋介石

原中联部副部长王力曾回忆说：毛泽东同我讲过，我党七大后犯了第一个大的历史错误。当时，蒋介石在台湾立足未稳，美国人也从台湾撤走了第七舰队，本来是解放台湾的最好时机，但我们只看到

胡宗南在西南还有大军，于是二野分兵去了西南，三野又要守备大城市和扫清残敌，所以没有把二野三野集中起来解放台湾，而是以劣势兵力在金門打了败仗。这样蒋介石在台湾的棋下活了。这是不能挽回的错误。”

中国大陆基本解放后，毛泽东即开始谋划解决台湾问题。在准备武力解放台湾的同时，也在准备着和平的一手。在朝鲜战争之后，由于美军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被向后推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把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向转移到了和平谈判上来，并为此付出了长久的努力，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中国共产党关于解放台湾问题的决心和计划，首先是建立在武力解放基础上的。根据毛泽东、

周恩来的设想，解放台湾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迅速组建海军、空军，掌握制海权、制空权；第二步，尽快解放东南沿海各岛，扫清外围，建立攻台前沿阵地；第三步，发起对台全面作战。

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时评。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7月初，毛泽东与朱德讨论了进攻台湾的问题。他们认为：只要苏联援助我们几十架飞机，掌握了制空权，解放军就可以发起进攻台湾的战役。7月3日，毛泽东和朱德致电华东军区的陈毅、粟裕、张爱萍：“新中国就要成立了，希望你们抓紧做好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做到中央一声令下，随时歼灭敌人。”

1949年10月金门之战的失败，并没有动摇党中央和毛泽东

解放台湾的决心。党中央研究后决定：1950年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解放海南岛、台湾和西藏，肃清境内一切国民党残余力量。随着1950年5月海南岛的解放，人们普遍认为解放台湾已为期不远了。

1950年5月17日，第三野战军前委发出了《保证攻台作战胜利的几点意见》，并成立了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以3个兵团、12个军，共50万人的兵力，投入对合作战准备。在1950年6月上旬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重申“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在会上也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具体实施步骤和各项攻台作战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当即决定，解放台湾的战役由粟裕具体负责实施。

美国的远东情报处发出哀叹：“台湾将于7月15日以前遭受中共全面攻击，由于政府军队涣散，民心浮动，中共将于发动攻击后数周之内顺利夺占台湾。”

但到了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到7月中旬，朝鲜战局严重恶化，美军从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遭受严重伤亡，形势急转直下。9月29日，毛泽东在给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信中指出：“以后请注意，只说是打台湾和西藏，不说任何时间。”10月2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并很快将战火烧至鸭绿江边。严峻的形势，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把解放台湾的时间向后推延。然而此后解放台湾问题久拖不决，却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

人民网 2013.12.23 文 / 何立波

子虚乌有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在中国史学界，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几乎成了共识。但实际上这是子虚乌有的事。这一传说的唯一依据是没有参与此事的第三者高一涵 1927年5月22日，在武汉举行的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的演讲《李大钊先生事略》，演讲中说陈独秀“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共产党事”。陈、李二人在赴天津途中所说的事，高一涵并不在场，显然是听人所说，后为了赶写这篇演讲，把听说到的事情写进去。讲后，大概有人质询或自觉没有证据，所以，第二天就把《李大钊先生传略》中这两句话删除了。但因为他当时演讲稿已经在第三天刊登在报上，于是为后世史家所误用。

其实，李、陈当时所谈的组党不是“共产党”，而是与无政府主义者建立“社会主义同盟”的统一战线组织。而这个组织也是俄国人策动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当事人章志的回忆《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和众多的佐证资料。

章志当时是无政府主义组织“少年中

电影《地道战》已经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揭示了当时河北军民怎样在平原上利用这一独特战术手段与机动火力都处在绝对优势的日军周旋。

在日军的记载中，对地道战又是怎样描写的呢？

令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在日军的作战回忆文章中，颇少关于“地道战”的记录。难道是土八路在地道战上夸大其词？

直到向日语学校的老师请教，才明白这不过是一个语言差异问题——日语里面，是没有“地道”这个词的，如同“地铁”在日语中就变成了“地下铁”，“地道”在日语中写作“地下道”，更多的时候，日本人把土八路的“地道战”称为“トンネル戦”，直译过来就是“隧道战”。

原日本陆军63师团老兵斋藤邦雄在《陆军步兵よもやま物語》一书中，专门用了一节写《地下道战法》，因为用了自己亲历的战斗为例，颇有些现身说法的意思。

“要在山区，遭到日本军队攻击的时候，(抗日军民)可以带着家财器物逃到日军顾及不到的深山中去。但在平原，这就不可能呢。想想看，一个平原的村子，四面被围，那无论怎样藏，都能被找出来吧？”

于是，河北的农民和民兵，就发明了地下道战这种史无前例的战法来。

斋藤写道：

最初，他们只是挖个地窖，躲避日本军的抓捕。然而，将其向深处延展，就形成了相通的地道。当然，地下道的入口，是开在日本兵不容易找到的地方。比如，外表看来是一口井，或者是一个猪圈里的草垛，即便是我们发现了，也没法进去。

国学会”会员，与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关系密切。1920年1月，他搬到一位姓姜的先生(即姜般若)家中住，那里还住着另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山西人尉克水。恰好这时，李大钊陪陈独秀来到天津。“次日晚间，李、姜、山西同志、南开学校的胡维宪同学连同我到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家中集合商谈京津地下工作情况约一小时。第二天天津《益世报》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原来“姜先生”的行踪是被政府监控着的。于是，他们纷纷离开了天津。“陈独秀先生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参加集会。”

这里的“苏联同志”就是鲍立维(又译作柏烈伟)。大陆不少学者称他是俄共派在天津从事秘密工作的专员，当时的重要任务是帮助中国的激进分子建立亲俄的革命政党。当时他住在天津，一周数次到北京大学去教俄语，因此与李大钊熟悉。但是在天津，他周围的中国人，多数是无政府主义者。如姜般若 1919年在天津成立“真社”，出版《新生命》；尉克水 1918年在山西成立

日本兵眼里的地道战

从地下道的秘密入口进去，里面竟然有时会达到人可以站着行走的高度，在一些地方，为了防止日本军放毒气，还会设立夹层结构。各处都有通风孔和观察外界动静的窥视口。

这样的地下道，把家与家，村子与村子连接起来，甚至发现过连接进县城的地下道。我们甚至想，要把这些地下道连起来，恐怕能达到万里长城的长度。

如此工事，都是靠一把铁锹挖出来的，令人不能不吃惊。

八路军和农民都从事这种挖洞的工作，为了不让日本军发现他们的秘密，他们甚至会用柳条筐把土运到地下道以外两三公里的地方抛弃。

注意到这种工事的日本军，抓捕农民和民兵进行过拷问，但我所见到的范围，从未从他们口中得到关于地下道秘密的情报。

我第一次八路军的地道战，是在保定东方叫做白洋淀的湖边。当时我们正在对其附近的一个村庄发动攻击。

讨伐队在这里发现了大约一个小队(一个排)的八路军，他们从村中撤出，逃到了村边的一座庙里。我军(指日军)立即将其包围，向这伙八路发起了猛攻。

最初，八路军从庙中不断还击，但渐渐还击的活力开始减弱。二十分钟以后，连一发子弹的还击也没有了。但我们并没有发起冲锋，因为这可能是诱使我们发动攻击的圈套。

我们向庙宇发射了烟雾弹，然后发出“哇~~~~”的呐喊声，却并不真冲。

这样做，会让对手以为日本兵开始冲

“平社”，出版《太平》。胡维宪、周恩来等人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也有很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鲍立维主张各派社会主义者(包括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组建革命组织。

曾在《新青年》上与陈独秀通信的无政府主义者郑佩刚说：“1920年3月，我接到黄凌霜(当时无政府主义者领袖)的信，说 he 到天津与俄国朋友鲍立维接洽，并约同陈独秀、李大钊等开会，成立了‘社会主义者同盟’，推举陈独秀为领导，并说陈独秀到沪活动，要我返沪相助。”梁冰弦也回忆说：“黄氏约陈独秀、李大钊与鲍立维在津在京叙话几回，结果产生‘社会主义同盟’，没有派系壁垒，只要是倾向同一大目标的都先团聚起来，共推陈独秀为领导人。北大和其他大学学生投身这旗下的众多而热烈。”

综上所述，陈独秀到上海初期(1920年5月至7月、8月)组织的团体，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社会主义同盟”，即与无政府主义者等社会主义者联合的统一战线组织。 《陈独秀全传》文 / 唐宝林

锋了，常常会乱扔手榴弹来阻止我军，如是三两次，我们就要发动真的冲锋了。

但是，这一次，庙里什么反应都没有。于是我们决定强攻——在机枪的射击掩护下正面攻击，同时以两个分队(班)上了刺刀，从左右包抄过去。结果，却发现庙里一个人都没有。

庙中，弹痕如同蜂窝一般，正中间供着一尊油彩斑驳的神像。“奇怪，敌人跑到哪儿去了？”我们开始思考。这个庙，肯定有到外面的秘密通道。

“这个神像有点儿可疑阿。”有人这样说。我们把神像挪开了，结果，下面出现一个大洞！这个洞完全可以让人钻出去逃走。

我们小心翼翼地用手电照亮里面，里面空空如也。可是，谁也不敢就这样钻进洞去搜索，这未免太危险了。

八路军逃到这个庙里，然后作出还击抵抗的样子，看来都是为了逃走争取时间。这不是把对此一无所知，认认真真组织进攻作战的日本军当作傻瓜来耍嘛？

“找柴禾，烧了这个庙！”有人提议。这时，队长跑进来，命令大家立即撤离。

这一次，队长的指挥是英明的。

我们刚刚离开这座庙不到三分钟，八路军的迫击炮 掷弹筒?)弹就在庙门前炸开了。

很明显，这是逃走的八路军看到日军钻进庙去，有机可乘，于是反过来用炮来攻击我们了。

如果出发得晚一些，面对八路军这种巧妙的地道战法，我们闹不好会把命丢在这里吧。”

斋藤的描述，从敌方的立场让我们看到了地道战真实的一幕。

人民网 2013.12.14 文 / 萨苏

我国古代的生育政策

在古代，关于生育问题有没有明确的规定呢？是否也实行过计划生育？

春秋越国生男生女都有奖励

战国初期我国总人口才1000多万，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全国人口翻了一倍。东周王室衰微，诸侯国争霸，战争连连，死亡巨大，可人口不减反增，就是当时各诸侯国实行鼓励多生的“计生”政策的结果。比如吴越之战，越国战败，勾践卧薪尝胆，实施强国战略，其中一条重要的举措就是鼓励生育，增加国内人口。

据《国语·越语》记载，越国的制度是，妇女快分娩时得报告官府，由官府派医生守护，生男孩的奖励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孩的奖励两壶酒一口猪。生三个子女的，由官府派给乳母哺育。

汉朝适婚女子不出嫁要罚金

在汉初刘盈(惠帝)当皇帝时期(公元前195年~公元前188年)，便有明确的“罚款”方案惩罚那些违反计生政策的人。据《汉书·惠帝纪》记载，在公元前189年，刘盈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即年龄在15至30岁之间的适婚女子如果不出嫁，将被罚款，罚款的金额是“五算”。“算”是当时计征人头税的一种计量单位，是开国皇帝刘邦定下的税收办法。15岁以上、56岁以下的国民，都要缴纳人头税，每人税款金额是120钱，称为“一算”。

对于西汉“五算”的罚款标准，在当时并不算低，至少是一个成年人一年的口粮。

担心“人满”之患 宋代提出少生、不生

在中国古代，也有一些学者意识到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严重问题，于是提出了少生甚至不生的口号，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是唐代的王梵志。

王梵志是唐初民间通俗诗人，生平坎坷，50岁后皈依佛门。他最有名的是其《大皮装大树》一诗中的一句“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

到了宋代，有学者估算中国人口总数首次过亿。在这种背景下，宋末著名学者、《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正式提出了“少生”、“优生”、重视人口质量和整体素质的“计生”理论。

《老人报》2013.12.18 文 / 张勇